

齐美尔的自由理论*

——以关系主义为主轴的诠释

郑作彧

提要:本文尝试探索齐美尔这位关系社会学奠基者的自由理论。在整体的掌握与梳理之后,本文认为,齐美尔将“自由”定义为“社会行动的可能性”,它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而得以生成,并且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奠基于货币经济之上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客观个体自由即是一例。同时,齐美尔也论证了,自由的重要特质在于让社会运作产生非线性的、不可完全预测的偶然演变,使得自由虽然可能带来创新,但也会造成风险。最后,本文指出了齐美尔自由理论当中的若干缺憾,以作为后续社会自由研究的可能的主题。

关键词:自由 齐美尔 相互作用 关系主义

一、前言:社会自由问题

密尔(John S. Mill)的经典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自从出版以来,就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影响。《论自由》的重要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不过对于社会学来说,也许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密尔提出了“社会自由”(social liberty)这个概念。密尔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提出社会自由,旨在探讨社会能施加于个体的权力的限度(Mill, 1999)。透过这个命题,密尔超越了过往政治哲学的讨论,不再仅抽象地探讨主体意志或仅聚焦在政治系统的治理技术或权力正当性,而是将自由纳入“社会”这个更全面的范畴当中。这为后来兴起的社会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不过,这个命题却同时也凸显了一个争议,即个体自由与集体权力之间的张力与矛盾。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WU15091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首先感谢匿名评审人给予许多中肯的批评与建议,让本文得以改善。此外,本文初稿亦得到许多同侪好友的批评指教,尤其感谢何健、蔡博方、张敦为提出的诸多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从西方启蒙思潮兴起以来,究竟是个体自由必须优先捍卫,还是个体自由必须服从集体利益、遵从集体权力所允许的集体自由,就一直是个问题(参见张旅平、赵立玮,2012)。密尔也是在处理这个两难问题。他提出社会自由的概念,让自由的两难问题又多了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讨论的途径。可惜的是,社会学对解决社会自由的两难问题,可能也同样容易陷入困境。因为社会学长久以来,也同样存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扞格。个体主义认为社会研究应从个体出发,因为只有个体的意义行动才是可经验观察的(Balog, 2012: 12)。对个体的关怀让个体主义的自由概念相信个体理性与强调个体自由,韦伯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作为个体主义的代表人物,韦伯在探讨自由时,特别强调个体自主性。他将个体自主性上升到道德伦理的范畴,以此坚称个体能动自由的不可撼动性(Schwaabe, 2002)。集体主义则遵循着涂尔干开辟的传统,认为社会研究必须宏观地探讨社会事实。集体主义倾向于将自由视作“总体社会事实”(total social fact)。因此相对而言,集体主义的焦点并不太在于个体自由,而是主要关心整体社会的分配正义问题,藉此探讨整合的或整体论的自由社会(Zafirovski, 2007)。一直以来,社会学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对立仍旧相当明显,这也使得社会学似乎不容易解决、反而容易强化了社会自由的两难问题。

不过近年来,社会学界开始注意到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都是过于极端的立场,各有缺失。为了突破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所产生的僵局,社会学开始思索“第三条路”的可能性。这也造就了近年来关系主义或曰“关系社会学”的兴起(Dépelteau, 2008)。^①

今天称作“简单的关系社会学”的早期关系主义,尝试指出个体和结构是相互辩证地影响的,藉此缓和个体与结构的对立;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即是代表之一(Mützel & Fuhse, 2010)。从这个路径出发对自由的探讨,也是试图指出由于个体和结构的辩证关系,因此个体自由可以在时间过程的面向上转换成集体社会自由,反之亦然(参见苏振华、赵鼎新,2012)。不过晚近的关系社会学认为,简单的关系主义实质上仍保留了个体与结构的差异对立,“个体与结构乃相互辩证”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今天的关系主义更进一步认为,社会不是一个个

^① 本文所提及的关系主义,仅意指社会学的关系主义,因此“关系主义”和“关系社会学”这两个词汇在本文当中为同义,并随脉络交互使用。

孤立的个体,也不是大于个体总和的集体,所以无关乎个体与结构的辩证协调;相反,社会就是一张关系网络,所以关系社会学所关心与观察的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诸种关系(Prandini, 2015)。这种较晚近的关系社会学的兴起,为社会学的自由研究带来了一些今天尚未正式处理的问题:社会学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都在运用自身的分析视角来关心自由议题,那么关系主义又会如何探讨自由?更重要的是,如果个体主义跟集体主义容易强化了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之间的矛盾困境,那么关系主义对自由的探讨,是否可以带来一些突破困境的契机?

社会学的个体主义常以韦伯作为主要奠基者,因此韦伯对自由的讨论,对个体主义的社会自由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出发点;集体主义则以涂尔干为奠基者,其社会自由研究亦为该取径的出发点。如此一来,探讨关系社会学的古典奠基者对于自由的分析,不啻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方式。今天,一般认为关系社会学的古典奠基者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Härfper, 2014)。过往也曾有其他主题的社会学研究试图从齐美尔那里寻找开拓关系主义取径的契机(Cantó Milà, 2005)。于是,齐美尔如何分析自由,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今天已有不少研究注意到并详细分析了韦伯与涂尔干的自由理论,但相比较起来至今鲜为人注意的是,齐美尔对自由也同样有丰富、一贯,且颇具原创性的见解。在他的早期著作《道德科学导论》当中,就有相当多的篇幅探讨自由的社会特质,并获得同时代的滕尼斯的高度评价(Tönnies, 1896)。在之后的如《货币哲学》等知名著作当中,自由也占有独立的章节或重要的篇幅。甚至他生平最后一篇未完成的遗著,就题为《论自由》。有学者即认为,齐美尔毕生的学术思想除了探讨文化变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在处理两个问题:藉由了解社会中的自由程度来探讨人类的创造力,以及描绘自由的界限(Helle, 2015: 1)。因此,若要探讨关系主义视角下的自由概念,齐美尔的自由理论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经典。鉴此,本文的任务,在于系统、整体地梳理齐美尔的自由理论,从中挖掘出不同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主义的自由概念。这个任务包括探讨以下问题:第一,齐美尔如何从关系社会学的视角界定自由概念?第二,在他的社会学思想当中,自由具有哪些社会特质?第三,他的自由理论有哪些未完成的缺憾,可以成为今天探讨自由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讨论的方向?

在进行这些工作之前,有两点必须先行交代。第一,本文并不是“齐美尔研究”,而是试图将齐美尔的自由理论作为主轴,探寻从关系主义视角分析自由的可能起点。因此本文不拟介绍齐美尔的生平,或进行齐美尔思想的引介。^① 第二,齐美尔对自由的研究散落在他早期、中期、晚期的众多著作当中,其讨论也不全然是从他的关系社会学视角出发,也有许多一般的政治哲学分析。毕竟齐美尔不只是单纯的社会学家,也是思想非常多元且深厚的哲学家。不过,为了紧密围绕本文的核心主旨,本文仅从关系社会学的观点,诠释性地整合齐美尔各个时期的自由研究。这样的诠释也许会忽略齐美尔在研究自由时所蕴含的多重视野与贡献,但这与其说是本文的缺失,不如说是未来研究可以接续的主题。

二、从哲学自由到经验自由:自由的社会学化

在齐美尔浩瀚的著作中,最早系统性地以专门篇幅分析“自由”的可能就属《道德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Morawissenschaft*)了。该书为两卷本,分别出版于1892年与1893年(两本皆于1904年在齐美尔加入新前言后再版),两本各近500页。对于多以短篇报章或散文形式发表作品的齐美尔来说,《道德科学导论》显然是他一生中少有、也是篇幅最大的专著。该著作的副标题“伦理学基本概念批判”(Eine Kritik der ethischen Grundbegriffe)即点出其主旨:长久以来,人类社会当中有许多被上升到伦理或道德层次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影响甚巨;然而若进一步思考这些概念,却会发现它们其实异常空洞,从未被详实讨论过。因此人们实有必要带着缜密的科学态度,批判性地重新检视这些重要的基本概念(Simmel, 1904a)。齐美尔挑选了几个他认为特别值得重新检视的概念,例如“应然性”、“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幸福”,以及本文的主题“自由”。

虽然齐美尔认为过往的自由概念过于空洞,但他并没有因此完全抛弃前人的理论基础。作为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齐美尔在《道德科

① 关于齐美尔的总体思想介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已出版非常详实而重要的著作,例如:成伯清,1999;陈戎女,2006;杨向荣,2009;Frisby,1984;Lichtblau,1997;Helle,2015。

学导论》当中对自由的探讨,自然亦从康德哲学的自由意志理论着手。不过他倾向将意志先转化为更具体的概念。齐美尔指出,一般政治哲学思想当中,自由通常首先意味着意志不受外力阻碍,但“意志”(Wille)本身不是主词,而仅是“意欲”(wollen)这个动词的名词形式;亦即意志本身并不是追求自由的主体,而只是一个意欲的过程。追求自由的意志,其源头必然还有一个意欲着的主体;这个主体无疑就是“自我”(Ich)。意志源生于自我;“自由意志”完整的内涵应是意指“自我能不受外力干涉地意欲着”。因此自由意志某种程度上无关意志,而是关乎自我(Simmel, 1904b: 136)。但自我显然并不总是能不受干涉地意欲着,否则自由就是常态而不具讨论的必要性。如此一来,自我就应当再被区分为“纯粹的自我”与“受外界干涉的自我”。这组区分亦可对应于康德哲学当中的理性(Vernunft)与感官性(Sinnlichkeit)的差异(Simmel, 1904b: 147)。

齐美尔指出,在康德哲学当中,理性被视作纯粹自我的本真思考,而感官性则被认为是外界物质刺激的结果。如果自我所意欲的来自理性,那么这种意志就是纯粹由自我所决定、是自由的;相反,如果自我所意欲的来自外界物质的刺激,就表示这种意志不由自我所决定,而是被外在物质世界所决定,因此就不算是自由意志。一般认为,理性自我意志与感官性自我意志之间的对立,大约等同于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对自由的追求也就必须抑制感官性自我意志、提升理性自我意志。但是齐美尔认为,将自我二分之后再以“自由/必然性”这组区分对立起来的自由概念,就经验来看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人不可能独立于外在世界而存在,因此“受外界干涉的自我”是自我必然具有的一部分;“纯粹的自我”与“受外界干涉的自我”不过是同一个自我的两个面向罢了。康德本人也不是要指出理性与感官性之间的对立,而是试图论证两者调和的可能性。齐美尔认为,如果自由牵涉到自我的意欲过程,那么自由就不是意指自我封闭在自身当中,而是意指自我不受阻碍地向外意欲、投射到外界去。若是自由只停留在理性思维的层面,那它也仅是没有意义的空想。所以将自我区分为理性自我与感官性自我,并将理性自我意志与自由连结起来,其重点不应该在于将自由与必然性对立起来,而是在于指出,自由牵涉到一种由自我凭借着理性的思维投身外界、介入外界的转化过程。自由与因果决定性并不是完全对立、非此即彼的;相反,它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

因果关系,一种以“内在所欲”为起因,“投向外在世界”为结果的过程。自我由内在理性投向外界的转化过程一般称作“行动”。相较于强调理性自我意志的哲学自由(philosophische Freiheit),行动是证成自由的具体形式,可视作一种经验性的自由(empirische Freiheit)(Simmel, 1904b: 158)。然而,不是所有的行动都是自由的经验形式,就像不是所有的意志都是自由意志。奠基在哲学自由的概念之上,齐美尔也强调,惟有符合自由意志的行动才能视作经验自由。哲学自由与经验自由不是两个对立的观念,而是两种不同层次的自由。哲学自由是经验自由的基础,它牵涉到在行动背后的自我心灵提升与超越的问题;经验自由是哲学自由的实现,所关系到的是如何实践、完成自我意志。不过,虽然哲学自由与经验自由是自由的一体两面,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但究竟行动是否出于自由意志,无从经验观察。因此哲学自由是哲学的问题,而不是社会科学的问题。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可以探讨的,是分析行动的条件与特质,藉此从经验层面掌握自由的内涵要素。^①如齐美尔所明言的:

整个社会学不只要针对意志自由,而更要针对行动的经验自由,亦即探问是否实际的、奠基在意识之上的意志,根据自身确立出了行动。(Simmel, 1904b: 197)

于此,齐美尔在不抛开形上学意涵的前提下,开始让“自由”再增加了经验分析的面向,并使之划入社会学研究的范畴。^②

而行动作为经验自由,之所以需要进一步讨论并因此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是因为什么样的行动可以说是理性而自由的,以及自我究竟该如何行动、行动又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不是自我可以独自判定与完成的。人一出生,只是一团会哭的肉,只有基础生命本能。任何自立与自我思考的能力都是后天由他人教导、或从他人那里学习得来

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绝不代表齐美尔因此就不再去探讨哲学自由、仅讨论经验自由而已。如前所述,齐美尔也是一位深刻的哲学家。尤其是他晚期格外关注生命哲学,深思生命如何是一个充满超越可能性的存在,并以此强调自我超越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关联。这些论述也非常重要(Simmel, 1918, 1923)。但由于本文旨在紧贴着(关系)社会学的观点探讨齐美尔的自由理论,因此齐美尔对哲学自由的探讨与贡献只能暂且略过。

② 以下所说的自由,除非特别强调,一律都意指齐美尔所谓的经验自由。

的能力。自由的实现,显然还需要自我之外的他人作为条件。这也带出齐美尔对过往自由概念的第二点批判:人所身处其中的外在世界,不是只有物质世界,还有一个由众多其他自我所构成的人际集体世界,亦即“社会”这个世界,而且社会是自由的重要前提(Simmel, 1904b: 172)。于此,就势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去探讨作为自由前提的社会是什么,另一方面去探讨在该社会前提下,自由的形式为何。

在《道德科学导论》这部早期著作中的这两点批判,铺展出了齐美尔之后整个自由理论的三大主题:自由的社会前提,社会前提下的自由形式,以及自由的内涵特质。其中,“自由的社会前提”牵涉到“何谓社会”这个基本问题,这势必也是齐美尔的社会学的自由理论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三、自由的社会前提

齐美尔身处的时代,亦是社会学成立之始。同时代的韦伯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的意义行动所反映出来的(Weber, 1964);涂尔干则认为社会是人类集体聚合而突现出来的整体(Durkheim, 1966)。齐美尔则提出了另外的观点。他认为,强调社会就是一堆个体、或强调社会是独特的整体,都有正确之处,他们所描述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因为观察角度不同,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过也因为这两个取径太过微观与宏观,因此都出现了观察的死角而有所缺失。将社会视作整体,忽略了如果没有个体,社会不可能存在,因此个体必然是社会的构成内容。但如果仅强调个体,也会忽略若仅仅是一堆个体毫无关联地凑在一起,并无法构成社会。一堆个体之间,必须要有着彼此影响的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构成人际关系网络,才有社会可言。而且人们将其指称为“社会”,是因为这些相互作用并不是随机的互动,而是一个奠基在相同规则之上,重复发生的动态人际关系,让人们能将其指认为一个单位性的整体。社会有整体性,但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由个体构成,但不是仅处于单独个体心中的虚无概念。社会的呈现来自持续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亦即持续的社会形成过程。如齐美尔所说的:

“社会”不过就是用以指涉由诸多个体所构成的范围的名称，这些个体透过持续作用的相互关系以彼此相连结，并使人们将其指称为一个整体。(Simmel, 1917: 14)

因此，齐美尔在其重要著作《社会学》(Soziologie)当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若要分析、了解社会，就必须探讨让社会得以形成的持续相互作用及其规则方式，亦即研究各种社会化的形式(Simmel, 1908)。而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持续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因为人是群体动物，无法脱离社会单独生活，必须彼此支持才能生存下去。^①人一出生，就会被教导并必须学会所归属的人际关系网络的观念与行动方式，知道为了生活该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这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行动，包括行动的目的是什么，该如何行动，都要有持续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网络才有可能。行动不是人类自然而然就拥有的天生才能，而是必须有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前提基础。在这样的社会概念之上，齐美尔指出，如果行动是自由的经验形式，那么，自由也同样绝不是一个自然给予的状态，而是一个由行动者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络传承给行动者的行动目的与方式；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行动的基础，是自由的前提(Simmel, 1900: 318, 1908: 57)。而行动必须具备的社会前提，也让自由具有几个过往相关研究常忽略的基本特质。

第一，个体若脱离社会，也就无从有任何自由(Simmel, 1904b: 171)。个体生活中所有的社会行动，都需要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与传承。个体自由也因此来自所属群体网络的自由。例如，一个人晚上肚子饿了，因此换上外出服，带了些钱，去商店买面包吃。而“买面包”这个社会行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被教导并学习到肚子饿可以这么做，而不是光着身子去路边啃树皮或抢劫。同时，这个社会行动得以实现，也是因为这时候商店仍有营业、有店员在上班，且电力公司需要继续营运输送电力让商店运作，或是有人制造衣服让他可以穿上……总之是有整体关系网络当中众多行动者的支持。就算是最基本的个体的“立足度日”，今天都必须在成为某个社会的公民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这个社

① 虽然也有人遗世独居，不与任何人接触，但姑且不论这是少数的例外情况，就算一个人能遗世独居，也是因为在在这之前他也必定先接受抚养、学习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之后才能以这种生活方式遗世独居。换言之，遗世独居本身也是人际相互作用当中习得的能力。相关的探讨可以参阅 Mead, 1967: 140。

会的全面正当支持,留于其中生活。否则一个无国籍人士,除了希冀道德关怀,不然在任何地方都只能不自由地苟且偷生。相反的,若个体所镶嵌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大、越有力量,个体的自由也会越大。藉此推论,齐美尔指出,过去常认为,自由就是不被任何外在的连带关系所束缚,这是一种免于某事的“消极的”自由。但如果消极的自由不转换为实际行动和成就某事的“积极的”自由,就没有任何意义。而积极自由必定要有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前提。因此连带关系不是束缚,而是必要支持。同时,要得到关系网络的支持,也要给关系网络以贡献。这也使得自由与义务总是并存的(Simmel, 1900: 297)。

(自由)似乎首先就是对社会连带的否定,因为任何连带都是一种束缚……然而,对于与他人处于连带关系的人来说,自由会有更加积极的意义。这种积极自由是一种与周遭环境的特殊关系,一种如果没有其他人就会失去意义的相互关系现象。(Simmel, 1908: 56-57)

在经验关系当中,纯粹消极意义——亦即不受束缚——的自由,几乎不会出现……消极自由还随即需要积极的持续实行,在持续实行当中,主体存有虽然会遭遇危险,但也会得到确证。(Simmel, 1904b: 244-245)^①

第二,自由没有先验的范畴,而是会随着不同的关系网络与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有所不同(Simmel, 1904b: 166)。任何行动,就算出自个

①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绝对不是像政治哲学普遍认为的,由英国哲学家柏林率先提出,早在齐美尔的自由理论当中,就已经透过社会学分析做出这样的区分(陈戎女, 2002: 13; Müller, 2011: 184)。在柏林那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虽然都各有优缺点,但由于他看到积极自由被纳粹德国发挥到极致而造成惨痛悲剧,因此他对积极自由带着极大的警戒与批判(Berlin, 2002)。1918年过世的齐美尔并没有经历二战,因此他对积极自由的态度较为肯定。但齐美尔也早就注意到,积极自由若过度发挥,会造成对他人的压迫,甚至摧毁他人。齐美尔的推论是,一般认为自由就是自我支配、自己管理自己,经验意义上则意指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以此而言,对外界事物乃至对他人的支配,可以说是自由的延伸。如果自由没有辅以道德责任,那么自由就可能造成对他人意志的侵略,极端的形式就是摧毁他人。比起柏林,齐美尔更为持平地强调,积极自由比起消极自由更加重要,但是绝对必须伴随着道德责任,才能避免不适当的扩张(Simmel, 1904b: 264)。

体的意志,只要超出了个体所属的关系网络在当下所传承的行动目的与方式,这个作为经验自由的行动就不会被允许实现。没有什么行动是自然而然应该自由的,也没有什么行动是自然而然不应该自由的。这不是说自由是纯粹社会建构的,而是说,自由有根本的社会原理,它对人类生活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自由的范畴与形式却不是自然、固定的,而是会随着不同的时空条件而有所不同。例如,人一直都有受教育的自由,这种自由的重要性是根本的,否则人类的知识将无法传承。但这种自由在过去只限于“贵族男性”这个关系网络,而今天,随着全民义务教育的出现,男性与女性、贵族与平民,都拥有了这种自由。

不过,当提到个体的自由就是个体所镶嵌的群体网络当下的自由时,想必会引起个体主义的质疑,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个体可能会具有独特创造力,而这种个体的独特性并不必然就是群体网络的自由,并且可能会改变了群体网络或被群体网络压迫(Joas, 1992)。^① 对此,齐美尔的回答有二。其一,个体的创造潜能当然不能忽视;但是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若个体没有镶嵌在某特定历史脉络下的关系网络场域当中,个体的创造力既无法培养出来,也不会被视作创造力。一个人也许有非常高的计算机程序编写天赋,但若他生在根本不存在计算机科技的2000年前的汉朝,也不会有一展长才的可能性。埃里亚斯便继承了齐美尔的观点,他曾详细论证了莫扎特若不是生在那个时代的奥地利,没有相应的音乐场域,即便他有再高的音乐天赋,也不会是音乐神童,无法发挥音乐的天分与创造力(Elias, 1991)。^② 被视作个体创造力的行动自由,还需要关系网络的定义与支持,才有实现的可能。其二,若个体的行动自由被群体网络所压迫了,对此自由的压迫并不会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个人,而是把此个人视为某个社会角色而进行压迫,亦即此个人被视作某一个网络关系的成员。这个成员的所作所为代表了某群体的行动观念或方式,因此被否认该群体网络的另外的群体网络所压迫了。也就是说,如果别人的自由被群体压迫了,那么这种对自由的压迫并不是过往经常认为的,是集体自由对某个个体的自由的压迫,而毋

^① 本文开篇提及的密尔显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捍卫个体自由的价值。

^② 埃里亚斯本人并没有明言他的研究继承了齐美尔,但今天学界已经普遍同意,齐美尔对埃里亚斯有重要影响,后者可以说是齐美尔的继承者。因此,埃里亚斯今天也同样被视作是关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Mongardini, 1996; Albert, 2013)。

宁说是一个群体网络对另外一个群体网络的压迫。这时,解决自由压迫的问题,也不是如过往经常讨论的那样,论证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的界限,而是去探讨群体网络之间的斗争问题(Simmel, 1904b: 183)。齐美尔指出,这种斗争,“意指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斗争,但也同时意指所有人争取所有人的斗争”(Simmel, 1908: 217),即这可以是抵抗其他群体网络压迫的斗争,也可以是争取其他群体网络的承认与支持的斗争。^①

齐美尔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自由的社会前提,让自由既不失去传统根基,又添加了随社会而异的经验性质。这提醒人们,自由并不是不需反思的普世真理,而毋宁是,如当代德国哲学家法比欧所说的,一种特定时空下的文化(Fabio, 2005)。近代西方社会重要的自由文化,无疑就是自由主义。身为西方文明之子,齐美尔也同样沉浸在自由主义的文化当中。不过他也意识到,这种自由只是当代西方社会——特别是奠基在货币经济与个体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他也将西方社会的自由形式当作战例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该分析最主要的部分表现在其名著《货币哲学》当中。

四、现代社会的客观个体自由

当今西方社会的特质与其中的自由形式,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大概可以从两条并行的现代化路径开始谈起:一是社会分化,二是随之而来的个体化(Lichtblau, 1988; Müller, 2011)。

齐美尔指出,社会分化可以粗略分为三个过程(Simmel, 1890)。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开始出现分工状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为了有效且省力地分配资源与劳动力,生产过程当中不同的劳动环节会开始特殊分化。第二个阶段为角色分化,即人们开始根据自己的专长,接手不同的分工内容,并随之确立自身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当中的角色。第三是功能分化,也就是社会随着分工与角色分化,开始出现各个依据

^① 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导者霍内特近年来运用了他的“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探讨社会自由的动态承认过程,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后续研究(Honneth, 2011)。

不同功能而分化开来的部门领域。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变革。齐美尔提到,在过去,一个人的身份与他的出身背景,与他所属的初级社群团体或家庭有关。他必须做的事,亦即他的义务,也受其影响。在那时,人的行动与义务有两种可能的形式(Simmel, 1900)。第一种典型是奴隶,奴隶的整个生命、所作所为都是要进行劳役。这种毫无自我可言的行动与义务形式,也当然毫无自由可言。第二种则是佃农,他的义务就是要交出被规定的产品。不过他如何交出产品,以及交出产品之外的事务,都可以出自他的自我意志;因此相较于奴隶,这种行动与义务形式有较多的自由。而伴随着社会分化,为了让社会分工得以可能,需要让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取决于他的专长角色。在这种角色分化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工作成为分工社会的劳动市场当中,透过付出劳动以换取生活所需的过程。而他的义务则是从他所获中拨出部分作为税租。社会分化过程中,由于社会分工与角色分化,人们脱离初级社群团体,形成一种以个人为单位的新的行动与义务形式。这即是现代化的第二条路径,个体化。然而,要让个体化得以可能,以满足社会分工与角色分化,有一个媒介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货币(Simmel, 1983)。

货币无疑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在这个基本命题当中,齐美尔一一拆解与清楚定义了几个关键词。所谓经济活动意指一个价值物的交换过程,其中,一方为了取得他人所拥有的、但对自己来说隔着一定的距离而不易取得的价值物,而交出自己所拥有的对方想要的价值物。在此过程当中,为了形成让两方,甚至是多方,都接受此为公平的等价交换,因此形成了“货币”这种衡量价值的媒介。货币的价值衡量能力具有客观性。换句话说,货币是一种将交换物的价值加以客观化的媒介。

随着社会分化,经济活动的交换物越来越多样,甚至包括抽象的劳动本身。而货币的客观化能力,也同样适用于估量劳动。货币作为估量劳动的媒介,因其特质而产生一个特色:由于货币是一个价值客观化的媒介,因此用货币估量劳动,也会将劳动主体加以客观化,让劳动的“人”变成客观的个别角色功能载体(Simmel, 1900: 312)。也就是说,透过货币的客观化,个体成为行动主体的单位形式,人被个体化了。如果行动是自由的经验形式,而在以货币经济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中,个体是行动者的单位形式,那么自由在现代社会中也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经验自由形式:客观的个体自由。齐美尔尤其强调个体自由的客观性。不过,齐美尔的客观性至少可以再细分出两种含义,这也使得现代社会的个体自由形式至少具有两种特质。

第一,客观性首先意指一种超越个别主体,能让所有主体都可以有同等认可结果的性质;不过齐美尔更强调的客观性,是对所有主体都普遍有效的标准性(Simmel, 1900: 33)。货币让客观性的这种含义达到极致:货币完全是一个客观的衡量媒介,它本身没有任何内涵。一旦一个人的劳动或劳动成果被转换成货币量,就意味着这个劳动或劳动成果被客观评估了,其重点只在于评估出来的量是多少。只要这样的量达到了能交易的标准,它就可以被接受,不论实际上劳动个体的行动内容、方式、精神是什么。这让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获得更多按照自己意志行动的可能性与多样性。劳动或劳动成果越能用货币衡量,就越客观,劳动个体就会越自由。用通俗的话来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专长自由从事任何活动,只要这个活动可以赚到钱就行,不论活动的内容是什么。^①比如精神活动,例如文化艺术创作或学术哲思,虽然本质上是主观的意志活动,无法具体地价值交换,但只要可以将其活动成果透过如绘画、著作等客观地呈现出来,并且再藉由货币完全客观化——或通俗一点说,任何文化艺术或思想,只要能产出具体作品、标上价格,并且只要有人愿意掏钱购买这些产品——就算是主观意志活动,也可以成为一种能赖以谋生的职业,让有此专长的个体可以自由地从事(Simmel, 1900: 333)。同样,在货币税收制度下,只要缴钱,就等于完成了纳税义务;至于完成义务的方式、内容是什么,个体可以有充分的自由自己决定、自己从事。

第二,客观性不只在于以货币将劳动加以客观化,而是更进一步地,货币也会将劳动主体客观化为“个体”,因此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客观性也意指在货币中介下,人被个体化之后的状态。如上所述,现

① 齐美尔的这种说法,仿佛认为所有可以赚到钱的活动,都是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行动,但这显然值得商榷。金钱是评估价值的客观标准,但不是惟一的标准。法律、伦理道德等等也相当重要。一项活动就算能够获得金钱,但如果违法,或是违反宗教教义,它也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齐美尔想必不可能不知道。但可以想见,由于在《货币哲学》或其他相关的著作当中,齐美尔特意将分析焦点放在金钱造成的文化情境,因此策略性地忽略了其他层面。

代社会的个体化,在齐美尔的理论当中,特别指为了应对社会分化当中的角色分化,透过货币的客观中介,使主体转变成客观的个别功能载体,让每个主体的初级社群团体归属感、特殊人格都被消弭掉。但是个体化并不是说人就成为孑然独立的单子,与社会世界毫无关联,人还是必须镶嵌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纽带之中。“个体”不是指单独的个人,而是一种当代社会关系网络的角色类型。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因为货币中介的客观个体化,使得人际之间可以不问主体的人格、出身,而是根据个体所发挥的客观功能而进行角色合作。透过货币的中介,人际关系可以抽象为功能角色的合作。齐美尔指出,比方传统机械连带的社群团体里,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当中所连结的对象是具体独特的,这也同时表示那个对象是不可替代的,这种连结也因此会成为被对象制约的依赖。而且因为具体独特的对象背后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格与出身背景,使得对对象的依赖会变得复杂而麻烦。但如果关系连结是以非具体的、抽象的,因此也是可替代的功能合作的方式进行,就可以从依赖当中解放出来,简化双方的关系,获得不被制约的行动支援。当人一律被归成“个体”这个角色,并且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成功能合作,那么人们就可以更容易地扩大人际关系网络,获得更多的行动支持,发挥更大的自由(Simmel, 1900: 315)。今天的社会生活拥有过去所没有的高度复杂性,行动,乃至整个生活所需要的关系网络支持也越来越复杂。但是货币让人际网络能以简化的方式完成前所未有的复杂度,让现代社会的个体自由达到过往难以达到的广阔程度。这也难怪,齐美尔有时颇为极端地强调:“人们可以将客观性视为自由”(Simmel, 1908: 510),“完全的客观性就是完全的自由”(Simmel, 1923: 26)。比方,今天我只要找一间旅馆,向柜台服务人员付钱,就可以自由地在一个陌生城市住一晚。我不必知道柜台服务人员的个性与出身背景,只要知道他的客观个体职责就行;同样,柜台服务人员也不用认识我是谁,只要知道我的客观个体角色是付钱的顾客即可。

在齐美尔对现代社会的观察当中,因为货币的中介,让人们获得了以客观个体作为形式的高度自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齐美尔因此就特别赞赏现代社会。相反,齐美尔直接指出:“自由与幸福的提升之间,绝对没有必然的关联”(Simmel, 1900: 317)。对他来说,虽然人们今天获得了高度的自由,但这种作为现代社会当中特殊形式的个体自由,

也会为人类生活带来一些问题。^①

首先,个体化让自由变得宽广,但也变得相当空泛、空虚。自由主义常声称,个体化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拥有独立自主能力的过程。但是齐美尔指出,“自由”与“平等”某种程度上是彼此矛盾的。^②因为在一般理念上,“自由”通常被认为要可以尽情发展个人特质,但“平等”却恰恰就是要抹平个人特质(Simmel, 1901)。而现代在社会分化与货币经济的背景下,“个体化”成为一种社会运作原则,更意味着人们在现代社会当中普遍被抽离个性、抽空特质,灵魂也会渐渐被抽干、变得空虚(Simmel, 1900, 1918, 1957)。在货币的中介下,个体化并不会让人变得孤立,但却可能会让人变得孤单。人们时常可以耳闻,有些人虽然家财万贯,显然拥有高度的个体自由,但这些人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何,不知道终日汲汲营营地赚钱是为了什么,所以感到生活空虚、不快乐。

其次,则是牵涉到自由的不确定性(Simmel, 1900: 365)。人被个体化、被抽离原初社群连带之后,不只变得孤单空虚,而且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断开了。所有行动,乃至总体生活,个体都必须自己思索该如何进行。再也没有一个共同体的传统生活方式为个体提供行动方针,告诉个体什么事值得追求、该怎么做比较好,也不会告诉个体什么错误可以避免。自由可能带来好结果,但也可能带来负面后果。所以个体虽然获得高度自由,但伴随着高度个体自由而来的,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而且一切都必须由个体自己承担。

不过,自由的不确定性,虽然在“客观个体自由”这个自由的形式当中,因为孤单而强化了焦虑感与个体的责任,但这并不是在以货币经

① 除了以下齐美尔自己提到的问题之外,也有学者注意到,齐美尔的理论揭示了人被客观个体化之后,缺乏自我,因而在金钱经济当中,被当作一个非主体人格的、可随意被工具地使用的“物”(Böhringer, 1984; Westerman, 2010)。将此概念充分延伸的学者,最重要的就是齐美尔的著名学生卢卡奇。他将齐美尔的“客观化”转化为“物化”概念,并连结上马克思理论而发展出重要的批判观点(Lukács, 1923)。也就是说,齐美尔的“客观化”某种程度上可以等同于后来较为常见的“物化”,虽然齐美尔对此现象不像卢卡奇那样完全抱着批判的贬意。尽管这方面的论述与本文没有太大关联,但不啻是一个有助于理解齐美尔的客观化概念的补充。

② 自由与平等之间矛盾(或是兼容)的关系,在齐美尔之前或之后,都有不少政治哲学的学者做过充分的讨论。详细的整理可以参考 Kymlicka, 2001。相较起来,其实齐美尔的论述并没有那么细致与全面。但他的贡献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探讨自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化过程中生成的特殊形式,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可能影响。这个取径的开拓,是值得参考的。

济市场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所独有的。齐美尔注意到,自由一般被认为与决定论相对立,那么,与决定论同样相对立的概念“偶然性”就会与自由有着无法忽略的关联。齐美尔甚至认为,如果将分析焦点放在以行动加以实现的经验自由的话,那么偶然性其实就是自由最主要的内涵特质;而且有趣的是,偶然性与决定论不必然是相对立的。

五、自由的偶然性

齐美尔指出,一般讨论当中“自由”与“决定论”的对立,某种程度上始于“自我”与“外界”这组对立。如果自我被外界介入,被外界形塑了主体的意志与行为,就是被“决定”了;但如果行动与意志相符,意志又足够施加进外界,那就是“自由的”。自我与外界的区分足以指出一个基本前提,即自我与外界彼此虽然深刻地相互影响,但是双方却难以完全预测与掌握对方。当然,主体总是渴望能够占有更多的主动性,而自由则让这种主动性得以可能。从这个命题出发,齐美尔更细致地论证了自由的两个意涵。

第一,自由是行动的可能性。如前所述,自由意指能依其意志进行行动。主体想这样做,可以这样做;想那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之所以这样是主动、是自由的,不只因为主体可以这么做,也是因为主体可以不这么做。换言之,自由意指主体拥有一种可以依其意志不同于实际所行动的行动可能性(Simmel, 1904b: 220)。

但是主体不会只有一次、两次的行动而已。正是在这一点上,齐美尔提出了自由第二个重要的意涵:自由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是意指自由会造成随意、无序混乱,或总是带来例外事件,而是强调,对自由的探讨,必须考虑行动的时间面向,以思索行动在复杂关系网络当中的非线性特质,以及后果的不可完全预测性。

齐美尔指出,过去的自由理论,常(错误地)将自由描述为一个仿佛没有时间性的能力或状态,所以才会转而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可以藉此稳定地保障自由。但主体是一个时间性的生命历程,行动也是一种持续过程。所以考虑某一主体是否自由,不可能只考虑它的某一瞬间是否自由,而是需要考虑此主体在行动过程当中是否拥有多样可能性。然而,一旦将自由从一种状态概念(正确地)转变为过程

概念,自由就会呈现出很复杂的样貌。一个自由的主体在第一刻依其自我理性意志实现行动,但是当这个行动开始进行之后,这个行动就外于主体,进入了外界,与外界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就是其他诸多主体的行动或外界物质作用力与这个主体的行动彼此造成影响。于是,主体实施行动之后,行动不再只是主体在第一刻于自身掌握下所进行的实践,而是成为一个镶嵌在关系网络当中、由多重外在要素复合而成的事件过程(Simmel, 1904b: 182)。这让行动有可能:一,依照主体的意图达到主体的目的,这是单纯的自由。或是:二,融合成一个高于主体的期待与想象的事件,也就是一般被认为是“创新”的结果。但也有可能:三,脱离主体的最初意图与掌握,把主体编织进一个不是它最初所想要的关系当中。于是,一个行动一开始是主体所欲的,但可能后来却变成主体所不欲的,使得自由造成不自由。或完全相反的:四,一个行动也许一开始是主体被逼、不想做的事,但后来却意外地,或透过斗争而来的协调而转变成主体想做的了,使得不自由反而带来自由(Simmel, 1904b: 163 - 164、181)。自由是行动的可能性,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可能性,主体无法完全预测自由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造成自由的偶然性。而且,当自由的偶然性将主体带向自己完全无法意料与掌握的后果时,可能反而会让主体感到仿佛被命运决定似的,让主体对自由产生“必然”的感觉。以此而言,偶然性与必然性不是对立的观念,而是自由行动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情境下,从不同的观察与认知角度,所提出的不同的暂时性结论。

在对行动偶然性与外界必然性之间的对立进行解构的同时,齐美尔也顺着这个解构方向,反思社会学研究的特殊性与目的。

自从启蒙时代与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自然科学“追求事物最根本而不变的规律法则”的研究目的,亦即挖掘与呈现主体外在世界的因果必然性的全息图,成为整个科学界的信仰与方针。但齐美尔认为,如果考虑到时间因素,外在世界没有什么现象具有“不变的规律”。人们之所以时时会有“外界具有必然性”的感觉,是因为关系网络当中诸多行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力,让人们难以全面看到行动与整个外在关系网络的交织过程,无法预测行动的结果,只能看到相互作用后的结果事件,所以人们常会感到仿佛外界有主体所不知的决定力量。而人们为了能掌握主动权,企图找出外界的不变规律。然而这种当今普遍称为“科学原理”的不变规律,只是人类自己从无尽的

时间流逝当中撷取一个小片段,透过有限能力进行有限观察、排置先后顺序所构筑出来的因果关系,而且人类还倒果为因地认为这种构筑出来的因果关系才是外在世界的原初法则(Simmel, 1904b: 208)。这种规律法则虽然是有限的构筑结果,但用于物质世界的确有很大的实用性。科学发展已经证明人类可以藉此对物质世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掌握主动权,让自然的因果决定性臣服于人类的意志行动。在主体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当中,“自由的偶然”与“外界的必然”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清楚的对立区分,因为自然外界与主体没有意识的交流,不会因为主体的态度或观念而改变自身的运作原理。但若把规律法则的决定论观念用于社会世界,情况就会不一样。

一般而言,将社会比做自然世界,并试图以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探索社会的因果法则,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目标。其中,主要是运用统计技术,归纳出可能的变项之间的可能因果法则。在此研究取径的视野当中,人们多半只会注意与重视社会世界的决定性必然法则,而不去探讨与关心自由。齐美尔认为这种取径太过偏颇。但他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齐美尔强调,“社会”这个外在于主体的世界并不是没有意志意识、对立于主体且与主体无关的具体物质对象,而是一张人际关系网络,而且主体(包括研究者)就作为关系网络的网眼之一而身处其中(Simmel, 1908: 24)。社会的运作没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在主体之间由众多自由行动相互作用所发挥出来的多重复合过程,并且可能受到研究结果所提出的新观念而改变行动态度,进而改变社会运作法则。在此前提下,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统计目的与自然科学的目的不一样。社会统计需要一定数量的样本,是因为默认了自由主体的行动必定会偏离平均,而惟有足够多的样本才能“做出”平均、“生产”法则。这等于默认了社会的自由偶然性(Simmel, 1904b: 193)。社会学实证研究不是要透过不断的证伪来逼近真理,而是承认自由的偶然性,因此尽量透过归纳的平均数来建立一个构筑的法则,以期能为每次的社会(行动)决策给出暂时性的参考建议。

以此而言,虽然过往的自由理论多对必然性怀抱着敌意,但若藉助齐美尔的观点来看,透过研究观察所构筑出来的必然性反而对自由来说是重要实用的。因为这种构筑出来的必然性,可以在复杂的社会行动、互动与决策过程当中,为人们提供行动可能性的范围,降低社会生活当中因自由而来的不确定性。从齐美尔的论证当中,人们可以轻易

了解到,自由越大,风险也越大。任何一个主体,在相互作用过程当中,因为自由而造成的微小变化,都可能为自己的行动过程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运作带来极大的意料之外的后果。面对这种自由的偶然性所带来的社会复杂性,齐美尔提到,主体在与其他主体的互动过程当中,因为对其他主体会有可预测与不可预测的方面,因此需要透过“信任”悬置不可预测的面向(Simmel, 1908: 263)。但是,齐美尔也指出,透过社会学研究(这里不只指实证研究,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观察),可以构筑社会法则,降低社会的不确定性,提升信任与社会互动的意愿和可能性,进而提升主体的自由(Simmel, 1904b: 234)。

对齐美尔的自由理论梳理至此,清楚表明了,齐美尔非常重视自由的价值,只是自由的问题对他来说可能主要不在于群己权界,而是在于社会关系的斗争与合作。特别是,社会学可以透过详实的科学研究,化约复杂性,扩大社会互动合作、提升自由,这也正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与贡献之一。

六、结语:走出未来社会自由研究的第三条路

近年来,关系社会学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契机,让社会自由研究多了一种讨论的方式,免于陷入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的两难困境。要探索关系主义视角下的自由概念,回溯齐美尔这位关系社会学的古典奠基者的自由理论,即是走出未来社会自由研究的第三条路的可能方式。

过去,齐美尔的自由理论也曾被一些学者注意到。德国学者弗茨克就曾以专书对齐美尔的自由理论加以分析(Völzke, 1987);在国内,潘利侠也有专文讨论(潘利侠,2013)。然而,弗茨克鲜有新意地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齐美尔的自由理论,错失了齐美尔的理论当中关系主义视角的重要洞见。而潘利侠则忽略了齐美尔其他重要著作当中对自由的分析,只注意到《货币哲学》中的相关篇章,因此其讨论略为片面。如果更整体一点地掌握齐美尔的自由理论,那么齐美尔的工作应该可以对社会自由研究给予更多的启发。这包括以下一些议题。

首先,齐美尔如何从关系社会学的视角界定自由概念?齐美尔透过对康德哲学的补充,指出着重意志的“哲学自由”必须再加上“经验自由”的面向,才能成为完整的概念。齐美尔所谓的经验自由意指主

体依其理性意志,在拥有不同于实际行动的其他行动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社会行动。而自由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主体并非孑然独立于世,而是必然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当中,在关系网络的支持与相互作用下,让社会行动得以拥有多样的实现可能性。借着经验自由的概念,齐美尔进一步探讨经验自由的社会前提、当代形式、特殊内涵等问题。也就是说,齐美尔将“自由”转化定义为“社会行动的可能性”,让社会学可以藉由探讨“社会行动如何可能”来研究自由的社会生成与自由的社会型态,以此开拓出一个摆脱群己权界矛盾的社会自由讨论取径。

其次,在这样的脉络中,自由具有哪些社会特质?齐美尔借着“社会化”、“相互作用”等经典概念来回答“社会行动如何可能”,也进一步回答了自由的社会特质。

“社会行动如何可能”其实也是社会学长久以来探讨的重要问题,帕森斯就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探讨(Parsons, 1949)。然而帕森斯却受到霍布斯的影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透过探讨“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来加以回答,这使得他与其后许多重要的研究常常转而探讨“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而不再去讨论社会行动本身(Habermas, 1989)。早于帕森斯至少一个世代的齐美尔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阐释社会行动的生成。他认为,社会行动是在相互作用的持续关系当中形成的。在此前提下,自由需要镶嵌在社会之中才有可能,并且会随着不同的社会脉络而有不同的特殊形式。在这当中,自由问题更多是关系网络之间反对压制的斗争,或是为承认而斗争。

就“镶嵌于社会”这方面来说,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由的重要特质,就是在时间因素的影响下,社会行动的相互作用会让社会运作产生非线性的、不可完全预测的偶然演变,使得自由虽然可能带来创新,但也会造成风险。而如何增加互动信任、降低风险、扩大关系网络的合作以提升自由,则是社会学可以做出贡献之处。至于在“不同的社会脉络有不同的自由形式”这方面,齐美尔则举出了奠基于货币经济之上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客观的个体自由作为例子。客观的个体自由有两点特质。第一,劳动的“人”在社会分化与货币中介下,变成客观的个别角色功能载体,其劳动与劳动成果只要能满足功能,就可以被接受,因此凭一己的意志行动的可能性与多样性被大幅扩展。第二,客观的个体化也让社会连结简化为个体角色功能合作的人际关系,

让人们可以更容易地扩大人际关系网络,获得更多的行动支持,发挥更大的自由。不过,货币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客观个体自由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尤其是自由带来越来越重的空虚感,同时也更大幅度地提升风险、带来不确定性。^①

齐美尔透过他的社会化、相互作用等奠定关系社会学思维角度的基本概念,提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自由概念。在探讨密尔意义下的社会自由时,这些概念对于摆脱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之间的矛盾困境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开端。不过,齐美尔的自由理论既然仅是开端,当然就还有许多需要接续探讨之处。除了关系社会学内部本身在今天也存在各种流派,每个流派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对齐美尔的自由理论加以发展之外,^②齐美尔的自由理论本身也还是有一些交代不清、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这些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关于自由的社会前提。齐美尔将社会视作持续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自由则是在关系网络当中构筑出来的行动的可能性。齐美尔曾在许多篇章中讨论了各式各样的相互作用过程与关系网络形式。但是,由于相互作用几乎堪为齐美尔理论的前提,因此相互作用与关系网络本身如何形成,关系网络之间压迫与斗争的内涵为何,在齐美尔的(自由)理论当中可惜几乎没有进一步的阐释。在齐美尔的理论当中,自由的形成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前提:第一,其他行动者支持这个行动者;第二,这个行动者使他人支持自己,让自己透过被教导与学习所得来的行动可能性得以实现。若将这两个层面交错起来,那么至少可以得出四种关于自由之获得(或无法获得)的可能情况:第一种,他人愿意支持自身所欲的社会行动;第二种,他人不支持自身所欲的社会行动;第三种,他人导致自身所不欲的社会行动;第四种,双方都不愿意,却实现了社会行动。这四点齐美尔多少都碰触到了,但缺乏全面而系统性的分析。这也为后继的研究留下了进一步细致分析自由的社会前提的任务。

① 自由增加了复杂性、提升风险;为了化约复杂性、降低风险,人们格外仰赖科学专家,以提升信任、扩大互动、维持或增加自由——这显然成为了一种现代社会的特殊循环。关于这一连串的循环,近代不少社会学家,如吉登斯、卢曼都有进一步接续的详细分析研究,值得参阅(Giddens, 1991; Luhmann, 1991)。

② 由于本文的主旨是探讨齐美尔的自由理论,以此作为开启关系社会学探讨自由议题的出发点,因此整个关系主义至今的发展与各流派的观点,受限于本文的主旨与篇幅,无法多加着墨。对此,可参考 Crossley, 2011; Donati, 2011。

其次,关于自由的特质。齐美尔颇具创意地指出,自由最重要的特质就是高度偶然性,并从中延伸出自由为社会学带来的任务不在于找出社会运作的定律,而是在于降低社会互动的不确定因素。齐美尔指出,许多自然科学的决定论者,虽然也承认许多时候自由的偶然性难以还原出可解释的因果关系,因此自然科学对于自由的偶然性常只能当事后诸葛,难以事先预测,但他们认为,这只是因为科学当下还没有能力找出当中的必然机制。随着科学的发展,任何的自由偶然性都势必可以还原为可预测与控制的因果机制。齐美尔当然反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论点。他认为,社会与自然物理世界不同,是由相互作用下,多重因果关联汇聚而成的事件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小小的变动都会造成不同的重大影响,包括正面的创造性与负面的风险后果。这是社会的本质,也是自由的特质,其无法还原为任何单一的因果机制。齐美尔的这套说法,应该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论点,但可惜的是,他却下了一个过于极端而阻断该说法继续发展下去的结论:“自由……意指一个纯粹没有根基的偶然性”(Simmel, 1904b: 207)。这个结论显然与他的“自由同时包含着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个论点颇有矛盾,也过于武断。

本文认为,如果把齐美尔的“纯粹的偶然”用另一个较新的概念加以替换,应会有帮助,也可以让齐美尔对自由特质的阐述更顺畅,那就是“复杂的突现”。在阐述自由的特质时,齐美尔提到的非线性过程、因果上的不可还原性等概念,在在都令人想起近年来在社会学中越来越重要的突现论(emergentism)。近10年来,社会学当中结合了复杂性理论的突现论认为,社会是一种由多重行动者所聚合而成的动态复杂系统,无法从个别行动者及其行动那里去解释或预测事件的发生(Sawyer, 2005)。^① 透过多重行动者系统模拟技术,今天社会学已经开始探讨自由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型态。不过,社会学的突现论借鉴自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然而系统理论如何避免将自然科学的概念生硬地照搬,如何将其恰当地应用在社会学研究当中,是个重要的问题。今天,一般社会学的复杂突现论将理论基础追溯至涂尔干的思想,认为社会有不可还原为个体心理层面的整体特质(Sawyer, 2011)。然而从本文的整理可以发现,其实齐美尔的自由理

^① 突现论当中还有许多细微的流派差异与丰富的争论,不过这并非本文的主题,因此不在此详细说明。可参阅 Greve & Schnabel, 2011; Piirainen, 2014。

论也能够为突现论提供相当有帮助的理论基础;而且同时,今天的突现论也显然可以扩展齐美尔的自由理论。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齐美尔的关系社会学理论与当代的突现论有高度的关联性。例如,稍微早期的史密斯指出,在齐美尔的思想中,“社会性”即是一种产自人类行动与互动的“突现特性”(Smith, 1989)。较新的则是普雷斯帝直接声称的,齐美尔理论中关于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的概念就是一种“突现论的”(emergentist)概念(Presti, 2013: 6)。然而,可惜的是,至今正式以齐美尔的古典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社会学突现论研究,还是几无进度,更遑论以此探讨自由议题。因此,将齐美尔的古典理论结合现代的复杂突现论,势必是未来的社会自由研究可以进一步进行的工作。

最后,则是任何社会学理论都需要回答的问题,即经验研究如何进行,以及如何提供实践方针。虽然齐美尔提醒人们,对自由的探讨,需要考虑到特定时空当中的关系网络,但是他自己也没有交代,镶嵌在特定关系网络当中的社会自由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以进行经验观察,更不用说对社会学的自由研究的成果,如何提供一个实践方针,这更是齐美尔理论当中的一大空白。当然,虽然相较于涂尔干或韦伯,齐美尔没有完整清楚地为他的社会学建立一套相应的方法论,但齐美尔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社会学方法论的探讨。正是齐美尔提出了“理解”(Verstehen)作为一种方法,并影响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Lichtblau, 1993)。稍后的象征互动论学派也是从齐美尔的思想中撷取了方法论的概念,从微观层面研究社会行动与社会互动(Low, 2008)。不过,自由毕竟不等于行动,而是“可以不同于实际所行动的行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除了实际发生的行动,重点还有没有发生的行动,而且实际发生的行动并不必然比没有发生的行动有更高的发生可能性。这些都似乎无法仅用“理解”、透过象征互动的观察来进行经验研究。若考虑到对可能性的研究,前述的突现论似乎也许可以为研究自由的方法论提出建议,但这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致探讨。无论如何,怎样为社会学的自由研究提出一套经验研究与社会实践的框架与方法,必然是未来无可回避且值得进行的任务。

除了本文对齐美尔的自由理论提出的上述批判与未来接续研究建议之外,齐美尔本人也时时思索着他的自由理论当中尚须进行的工作。在齐美尔晚年,生命哲学成为他非常核心的研究主题(Silver & O'Neill, 2014)。同样,在他未完成的遗著《论自由》(über Freiheit)当中,也特

别关心生命与自由的关系,尤其是生命的持续性(Stetigkeit)如何可以借着自由,发挥出多采多姿的可能性与创造性。齐美尔认为,因果关系来自对事件在线性时间上的切分(把时间流逝线的某个时间区段切出来当作因、把另一个时间区段切出来当作果)。但生命是一个持续且复杂的非线性的存在,“人们把自由预设为……一个单一层次、单一意涵的概念,是一个原则上的错误”(Simmel, 1923: 30)。生命没有因果,只要活着,它就是一段有无限可能与无限创造性的自由灵魂。在可贵的自由灵魂当中,齐美尔最后问的问题是:“人要从何自由?人又向于何处而自由?”(wovon man frei ist, wozu man frei ist)(Simmel, 1923: 30)^①

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学术的研究问题,不如说是一位智者 in 回顾一生时的呢喃沉思。这也提醒了后来的社会学研究者,应该抱着一种谦卑的态度,秉持着对生命的关怀,推开追问自由问题的大门。

参考文献:

- 成伯清,1999,《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 陈戎女,2002,《译者导言》,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2006,《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上海书店。
- 潘利侠,2013,《货币经济与个体自由——〈货币哲学〉中的个体自由问题》,《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
- 苏振华、赵鼎新,2012,《重新思考群己权界: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考辨》,《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杨向荣,2009,《现代性和距离: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旅平、赵立玮,2012,《自由与秩序: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演进》,《社会学研究》第3期。
- Albert, Gert 2013, “Figuration und Emergenz. Zur Ontologie und Methodologie des Ansatzes von Norbert Elia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65.
- Balog, Andreas 2012, “Soziologie und die, Theorie des Handelns.” In Johann August Schülein & Gerald Mozetič (eds.), *Handlung: Neue Versuche zu Einem Klassischen Thema*. Wiesbaden:

^① 齐美尔在人生最后问的这个问题,其实颇有歧义。“wovon”有“从何而来”的意思,但也有“免于何事”的意思;同样的,“wozu”有“向于何处”之意,但亦有“为了何事”之意。在这篇遗稿当中,齐美尔再次回顾了他在年轻时就区分出来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因此这个德文问句,对照这组区分,可以译为“人免于何事而自由?人成就何事而自由?”但在问这个问题之前,齐美尔也同时回顾了他的生命哲学,强调生命的持续性,以及对生命意义追求的重要性。所以这个问句也可以依此译为“人要从何自由?人又向于何处而自由?”由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组区分,今天已经成为政治哲学的经典概念,而本文却有意要与政治哲学保持距离、紧贴着(关系)社会学,因此本文将“wovon man frei ist, wozu man frei ist”这句话,翻译为“人要从何自由?人又向于何处而自由?”

-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Berlin, Isaiah 2002,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öhringer, Hannes 1984, "Die, Philosophie des Geldes' als ästhetische Theorie." In Heinz-Jürgen Dahme & Otthein Rammstedt (eds.), *Georg Simmel und die Moderne: Neue Interpretationen und Materiali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Cantó Milà, Natylia 2005,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Georg Simmel's Sociological Relationism*.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 Crossley, Nick 2011, *Towards Relation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Dépelteau, François 2008, "Relational Thinking: A Critique of Co-deterministic Theories of Structure and Agency." *Sociological Theory* 6(1).
- Donati, Pierpaolo 2011, *Relation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Durkheim, émile 1966,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 Elias, Nibert 1991, *Mozart: Zur Soziologie eines Genie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Fabio, Udo di 2005, *Die Kultur der Freiheit*.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 Frisby, David 1984, *Georg Simmel*. Chichester: Ellis Horwood.
- Greve, Jens & Annette Schnabel 2011, "Einleitung." In Jens Greve & Annette Schnabel (eds.), *Emergenz. Zur Analyse und Erklärung komplexer Struktur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89, "Erläuterungen zum Begriff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In Jürgen Habermas (ed.),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Härpfer, Claudius 2014, *Georg Simmel und die Entstehung der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Eine netzwerksoziologische Studie*. Wiesbaden: Springer.
- Helle, Horst J. 2015, *The Social Thought of Georg Simmel*. London: Sage.
- Honneth, Axel 2011, *Das Recht der Freiheit-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Berlin: Suhrkamp.
- Joas, Hans 1992, *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Kymlicka, Will 2001,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chtblau, Klaus 1988, *Gesellschaftliche Rationalität und Individuelle Freiheit. Georg Simmel und Max Weber im Vergleich*. Fernuniversität Hagen; Fachbereich Erziehung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 1993, "Simmel, Weber und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 *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 3.
- 1997, *Georg Simmel (Campus Einführungen)*.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Verlag.
- Low, Jacqueline 2008, "Structure, Agency, and Social Reality in Blumeria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 Influence of Georg Simmel." *Symbolic Interaction* 31(3).

- Luhmann, Niklas 1991, *Soziologie des Risikos*.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Lukács, Georg 1923,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Darmstadt: Luchterhand.
- Mill, John S. 1999, *On Libert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 Mead, George H. 1967,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ongardini, Carlo 1996, "Wie ist Gesellschaft möglich? Georg Simmel, Norbert Elias und die Aufgaben einer soziologischen Neuorientierung." In Karl-Siegbert Rehberg (ed.), *Norbert Elias und die Menschenwissenschaften Studien zur Entstehung und Wirkungsgeschichte seines Werke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Müller, Hans-Peter 2011, "Soziale Differenzierung und Individualität: Georg Simmels Gesellschafts- und Zeitdiagnose." In Harald A. Mieg (ed.), *Georg Simmel und die aktuelle Stadtforschung*.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Mützel, Sophie & Jan Fuhse 2010, "Einleitung: Zur relationalen Soziologie. Grundgedanken, Entwicklungslinien und transatlantische Brückenschläge." In Sophie Mützel & Jan Fuhse (eds.), *Relationale Soziologie. Zur kulturellen Wende der Netzwerkforschung*.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Parsons, Talcott 194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Glencoe/Illinois: The Free Press.
- Piironen, Tero 2014, "Three Senses of 'Emergence': On the Term's History, Functions, and Usefulness in Social Theory." *Prolegomena* 13(1).
- Prandini, Riccardo 2015, "Relational Sociology: A Well-defined Sociological Paradigm or a Challenging 'rational turn' in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25(1).
- Presti, Patrizio L. 2013, "Social Ontology and Social Cognition." *Abstracta* 7(1).
- Sawyer, R. Keith 2005,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Emergenz, Komplexität und die Zukunft der Soziologie." In Jens Greve & Annette Schnabel (eds.), *Emergenz. Zur Analyse und Erklärung komplexer Strukturen*. Berlin: Suhrkamp.
- Schwaabe, Christian 2002, *Freiheit und Vernunft in der unversöhnten Moderne; Max Webers kritischer Dezisionismus als Herausforderung des politischen Liberalismus*.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 Silver, Daniel and Kristie O'Neill 2014, "The Significance of Religious Imagery in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Money and The Transcendent Character of Lif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7 (4).
- Simmel, Georg 1890, *über soziale Differenzierung. Soziologische und 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 1900, *Philosophie des Gelde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1901, "Die beiden Formen des Individualismus." *Das freie Wort. Frankfurter Halbmonatszeitschrift*

- für Fortschritt auf allen Gebieten des geistigen Lebens*, 1. Jg., Nr. 13.
- 1904a, *Einleitung in die Moralwissenschaft: Eine Kritik der ethischen Grundbegriffe. Band 1.* Stuttgart/Berlin;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 1904b, *Einleitung in die Moralwissenschaft: Eine Kritik der ethischen Grundbegriffe. Band 2.* Stuttgart/Berlin;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 1908,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1917, *Grundfragen der Soziologie: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Berlin/Leipzig; G. J. Göschen'sche Verlagshandlung.
- 1918, *Lebensanschauung. Vier metaphysische Kapitel.*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1923, “Über Freiheit. Bruchstücke aus dem Nachlaß von Georg Simmel.” *Logos: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der Kultur*, Band XI.
- 1957, *Das Individuum und die Freiheit. Essais.* Berlin; Verlag Klaus Wagenbach.
- 1983, “Das Geld in der modernen Kultur.” In Heiz-Jürgen Dahme & Otthein Rammstedt (eds.), *Schriften zur Soziologie. Eine Auswah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Smith, Gregory W. H. 1989, “Snapshots ‘Subspecie Aeternitatis’; Simmel, Goffman and Formal Sociology.” *Human Studies* 12.
- Tönnies, Ferdinand 1896, “Georg Simmel: Einleitung in die Moralwissenschaft. Eine Kritik der ethischen Grundbegriff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und Physiologie der Sinnesorgane* 10.
- Völzke, Erhard 1987, *Das Freiheitsproblem bei Georg Simmel.* Bielefeld; B. Kleine Verlag.
- Weber, Max 1964, “Soziologische Grundbegriffe.” In Marianne Weber (ed.),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erster Halbband).* Köln/Berlin; Kiepenheuer & Witsch.
- Westerman, Richard 2010, “The Reification of Consciousness;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 Lukács's Identical Subject-object.” *New German Critique* 3.
- Zafirovski, Milan 2007, *Liberal Modernity and Its Adversaries: Freedom, Liberalism and Anti-Liber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eiden; Brill.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 闻 翔